

社会资本参与和美乡村建设的困境及其 消解:从外嵌悬浮到融合共生

陈永强,于水*

(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5)



摘要 社会资本已成为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破解社会资本参与和美乡村建设的“悬浮化”问题对加速乡村振兴意义重大。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借助组织嵌入、资本嵌入、关系嵌入、文化嵌入等方式重塑乡村社会治理格局,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注入强大动能。然而,在与乡村多元力量动态博弈的过程中,社会资本与基层自治的间断张力、形式嵌入与实质融入的经营权衡、资本生产与农民群体的脱嵌遭遇、工商文化与小农文化的交织碰撞等复杂境况使得社会资本陷入角色悬浮、项目悬浮、制度悬浮、理念悬浮等脱嵌困境。为此,基于融合共生的发展导向,从激活共生单元协同力、加快形成共生意识、强化共生关系维系、促进城乡文化融合四个维度构建社会资本参与和美乡村建设的共生新图景,推动社会资本从“脱嵌悬浮”向“融合共生”转变。

关键词 悬浮;融合共生;社会资本;和美乡村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4)05-0134-09

DOI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24.05.012

党的二十大提出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擘画了乡村建设的未来图景。然而,宜居宜业硬件基础设施总体水平不高、区域分配失衡等问题依旧是制约高质量和美乡村建设的显著因素。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完善乡村振兴多元化投入机制,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以促进乡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同时,文件也强调要有效防范和纠正投资经营中的不当行为,为社会资本参与和美乡村建设提供了清晰明确的政策指引。社会资本参与和美乡村建设并非仅仅意味着资金的简单注入,而是一个“引入—参与—嵌入—融合”的复杂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资本作为乡村发展的助力器与催化剂,其能否真正扎根于乡村土壤,与乡村社会实现深度融合与共生,成为乡村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然而,实践操作中,社会资本参与和美乡村建设却常常面临“嵌而不入”“融而不合”的悬浮化困境。这里的“悬浮”一词,原指物体未落地或浮于表面,在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在基层治理语境中,“悬浮”常被用于形容治理权力未能有效落地,治理要素未能深入基层。在乡村治理语境中,社会资本悬浮则指社会资本与乡村社会的割裂和疏远,具体表现为外嵌的社会资本与乡村社会的实际发展需求之间存在不匹配或脱节的现象。社会资本的这种悬浮状态不仅阻碍了其有效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动力,增加了社会资本自身的经营风险,同时也限制了乡村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影响了和美乡村建设的整体推进。因此,解决社会资本的“悬浮化”问题,对于加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程,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回顾

已有关于社会资本参与和美乡村建设的悬浮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收稿日期:2024-01-16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强产业促就业’双轮驱动民生高质量发展研究”(2023SJZD016);江苏省社会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江苏农村空心化问题及其对策研究”(24JZA-009)。

*为通讯作者。

一是关于社会资本下乡引发的不良反应研究。引导社会资本下乡的初衷是有效供给乡村建设所需要的资金要素,吸引更多生产要素向乡村聚拢,加快乡村振兴步伐^[1]。但资本下乡并未按照预期政策设想顺利落地,反而引发了一系列不良反应。如工商资本规模化的生产经营方式,使其占据更多市场份额,挤占了小农的生存空间^[2]。部分企业借助资本下乡的机会,与基层政府、村社组织合谋,依托项目承建获取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套取国家配套资金和惠农补贴,甚至炒作土地以谋取超额利润,变相助长了“圈地”风气^[3]。耕地过度资本化后,部分获得土地经营权的社会资本,在比较收益的驱使下,选择了耕地的非粮化^[4],转而从事蔬菜、瓜果、药材、花卉等高值农作物经营,影响主粮作物产量,危及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底线^[5]。资本下乡增加了农村社会的不确定性,引发土地流转纠纷、环境污染、社会治安等问题^[6]。地方实践中存在社会资本过度涉入农户土地权益、不尊重农户独立法律主体地位、有意压低土地流转价格、拖欠款项等侵犯农户利益的现象^[7]。部分下乡资本与反哺三农的政策初衷相悖,甚至异化为“倒吸”乡村资源和骗取政府补贴,给农民带来心理恐慌^[8]。部分地区因缺乏宏观规划,扎堆发展农旅项目,导致同质化竞争与资源浪费,甚至面临经营失败的风险。

二是针对资本下乡悬浮于乡村社会的成因探讨。资本悬浮于乡村社会是资本下乡动机、经营理念等内部因素与村庄社会伦理、宏观政策支撑等外部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从资本内部看,资本下乡动机不纯为资本悬浮埋下了伏笔。有研究指出部分资本下乡的动机并不纯粹,其看重的营利点并非农业本身,而是乡村特有的土地资源及政府给予的项目资金与高额补贴^[9]。一定程度上资本下乡产生的悬浮问题是资本自身自愿选择的结果。此外,资本下乡受经营方式与管理理念的影响较大。由于经营管理场域的变迁,资本经营方式与小农经营体系间的张力,使资本下乡初期普遍遭遇雇工管理难题^[10]。资本下乡采取工业化思维的雇工经营管理模式,无法适应农业产业的特殊性,引发经典的劳动监督激励问题,各种“磨洋工”的出现直接提升了雇工劳动的人力成本,导致下乡资本亏损^[11]。从外部环境看,社会资本与乡村社会的互动不畅是引发资本悬浮的重要诱因。社会资本是来自乡村秩序之外的力量,与乡村社会特有的伦理习俗存在天然张力。大国小农的千年传统影响深远,农村土地细碎化与土地流转纠纷问题依然存在,提升了社会资本入局乡村建设的沟通成本^[12]。同时人才“不回来”“不下来”及留守群体人力资本不高,影响社会资本投资成效^[13]。此外,土地经营权法规体系中关于土地经营权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价格指导和价格监测机制建设尚不健全^[14],在如何规范集体经济组织服务行为,促进其中介组织功能发挥的立法上还待完善^[15-16]。

总体看来,既有研究探讨了社会资本悬浮于乡村社会引发的不良反应及其成因,为更好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和美乡村建设奠定了基础。但已有研究仍显得不够深入,具体而言,和美乡村建设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于社会资本如何嵌入和美乡村建设、其嵌入过程如何,以及企业类社会资本参与和美乡村建设为何会遭遇脱嵌悬浮困境,无法与乡村社会深度融合等问题,尚缺乏细致的考察和系统性的回答。此外,从共生理论视角探讨社会资本如何消解悬浮困境,实现与乡村社会共生共融的研究也相对匮乏。因此,研究基于W公司经营D村的田野考察,建构“多元嵌入—脱嵌悬浮—融合共生”分析框架,对社会资本嵌入并赋能和美乡村建设的行动机制展开全景式分析,并对脱嵌的社会资本面临的悬浮化问题进行系统剖析。最后,从融合共生理论角度,倡导构建和美乡村建设的共生系统,旨在提高社会资本参与和美乡村建设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推动社会资本实现从脱嵌悬浮状态向融合共生状态的质变。

二、“多元嵌入—脱嵌悬浮—融合共生”的框架建构

“嵌入性”的概念最初由匈牙利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Karl 1944年提出。借“嵌入性”概念分析了经济与社会间的关系,Karl认为人类一切经济活动总是嵌入到所处的制度环境与社会关系中,并提出互惠、再分配、交换三种不同的嵌入模式,引发了经济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关系命题的思考^[17]。1985年,嵌入性理论的另一代表人物美国斯坦福教授Granovetter创新性提出了“网络嵌入”的概念,认为经济行动和经济过程是嵌入到社会网络中的,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其经济行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

深受其所处社会网络的影响。社会网络不仅为经济行动者提供了信息和资源,还影响了他们的决策和行为方式。Granovetter将嵌入细分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两种类型,其中关系嵌入主要关注行动者之间直接的网络联系,如信任、合作等规范对经济行动的影响。而结构嵌入则侧重于组织之间通过第三方形成的关联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如何影响资源流动和信息传递^[18]。Hagedoorn基于层次结构视角将嵌入性分为环境嵌入、组织嵌入以及双边嵌入三个层次,其中宏观的环境嵌入包含国家环境和产业环境对组织合作的影响,中观的组织嵌入是指组织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其经济行为的影响,微观的双边嵌入是指组织合作双方的信任合作关系对行为的影响^[19]。Zukin提出了嵌入性的四种类型:结构嵌入、认知嵌入、文化嵌入和政治嵌入,为理解组织和社会网络中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对经济社会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此,嵌入性理论逐渐走向成熟^[20]。

嵌入性理论为社会资本参与和美乡村建设提供了理论分析视角,为理顺社会资本与乡村社会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据此,建构了“多元嵌入—脱嵌悬浮—融合共生”的分析框架(如图1)。社会资本参与和美乡村建设是作为嵌入主体的社会资本与嵌入客体的乡村社会逐渐融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资本因地制宜地借助组织、资本、关系、文化嵌入等方式进入乡村社会,获得乡村合法身份,强化经济联系,缓和先天张力,重塑乡风文明。此为社会资本的“多元嵌入”。而现实情境中,社会资本参与和美乡村建设名义上是嵌入主体,实则是乡村社会之“客”,社会资本在嵌入乡村社会大环境的过程中因保留自身的行动逻辑与思维方式,容易引发诸多不良反应与乡村排斥而脱嵌于乡村社会,面临角色悬浮、项目悬浮、制度悬浮与理念悬浮等多维困境。这一现象称为社会资本的“脱嵌悬浮”。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社会资本嵌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中未能真正理解机械嵌入与融合共生的本质区别,并未与乡村社会建立起融合共生体,因而,建设社会资本与乡村社会的“融合共生系统”成为消解社会资本悬浮困境的有益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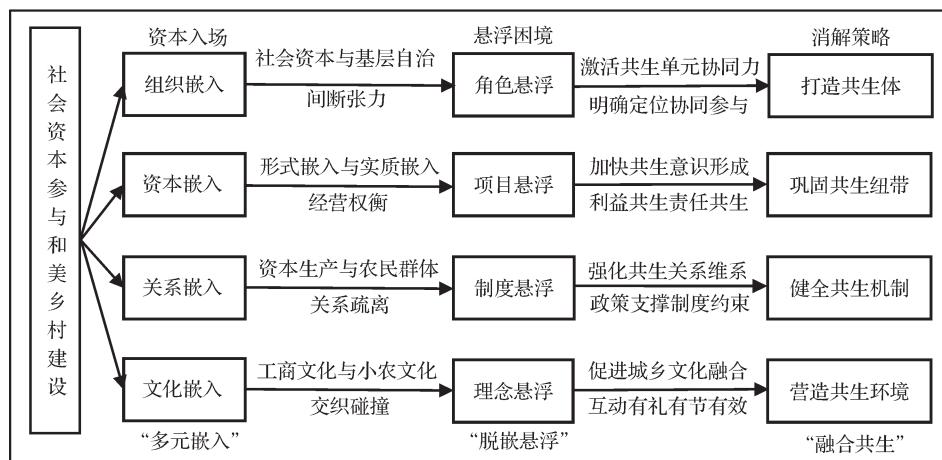


图1 “多元嵌入—脱嵌悬浮—融合共生”的框架

三、多元嵌入:社会资本参与和美乡村建设的D村实践

D村地处江苏X市西北部,苏中里下河腹地,紧邻世界四大花海之一的千垛菜花景区,全村1020户、3720人口,是环境优美的鱼米之乡。W公司属于地产公司,因转型需要,W公司将自身的定位设定为“城乡建设与生活服务商”,D村成为W公司转型做美丽乡村和乡村振兴计划的第一站。为更好地留住青山绿水,促进乡村发展,2017年7月,W公司、X市政府和D村村集体三方携手,在全国首创“社会资本+地方政府+村集体”的发展模式,以D村为“试验田”,打造乡村振兴的江苏样板。W公司作为社会力量主体,借助组织嵌入、资本嵌入、关系嵌入、文化嵌入等方式参与D村农业产业、农产品经营、乡村旅游、研学教育、村内建筑、景观及部分公共性载体等和美乡村建设工作。经过三方协作,D村入选中国最美村镇、首批江苏省乡村旅游重点村、首批江苏省传统村落名单、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名单,探索出了一条社会资本参与和美乡村建设的可持续、可复制的运营模式。

1. 借助组织嵌入寻求乡村“代理人”,获得乡村合法“身份”

W公司借助组织嵌入方式参与D村和美乡村建设主要依靠两种途径,一是依托政府及村社组织等现有载体入局。一方面,X市政府以项目招投标的方式吸收W公司参与D村建设,并以W公司为相对控股方(占股51%)与X市国资公司成立合资公司,专门负责D村的建设和运营。另一方面,社会资本入场初期亟须寻求“中间人”获取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土地、劳动力等关键要素。D村村两委既是国家治理“代理人”,又是农民权益“守门员”,成为W公司嵌入乡村的重要组织凭借,W公司依托村两委完成了政策宣讲、土地流转与工人招募等事项。二是吸纳乡贤能人进入项目管理团队。乡贤能人本身就是一种人力资源,与城市外聘人才相比,乡贤能人群体更接地气,更懂本地农业规律,是满足W公司投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人才需求的重要资源。W公司邀请D村有威望的老支书与网格长参与土地流转工作,极大降低了土地流转面临的信任成本与时间成本,减少了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非必要纠纷,减少了W公司与D村乡土社会的直接摩擦。

2. 借助资本嵌入改善宜居宜业硬件基础,强化乡村经济联系

一是以“针灸式改造”修复宜居乡村风貌。W公司采取“针灸式改造”方式,以微介入、轻建设的投资改造,最大限度保留D村的传统风貌,延续村落的历史记忆。不到一年时间里,D村在W公司的参与下已经建起了村民食堂;集文化娱乐、老年康健为一体的村民服务中心;修葺24间新房作民宿;改造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等。伴随着一系列改造,D村知名度显著提升。二是以“品牌化运营”推进宜业乡村建设。D村所在市拥有全国最大的粮食交易市场,W公司着力推动D村粮食交易从注重“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的转变。W公司投资打造“D村大米”“青田萃”等农业IP,有效带动了农产品消费品牌升级和村民就业。W公司乡村事业部负责人XZH表示:“今年陆陆续续回来十几个人了,村民食堂里工作的都是D村当地人,除了回来做厨师、做服务员,还有回来做导游、讲解的”。目前,D村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为主,并向农村资产盘活、特色产业发展、休闲观光等新兴领域扩展,乡村宜业产业体系基础改善明显。

3. 借助关系嵌入打入乡村熟人关系网络,缓和先天内外张力

W公司借助正式的契约关系与非正式的代理关系、人情关系嵌入D村社会关系网。第一,契约关系是社会资本与农民在权益保障上达成共识的正式结果。W公司参与D村建设初期与X市政府签订项目合同,与D村村社组织签订股份合同、土地流转合同,与农户签订雇佣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建立契约关系,为双方提供法律保障。第二,社会资本与村社组织、乡村能人等形成代理关系嵌入乡村社会。面对陌生投资场域,W公司投资D村建设期间往往主动寻求X市政府与村社组织的帮助,减少自身与农民直接打交道的障碍,依托乡村社会代理人拉近与乡村社会的距离,打消农户土地流转顾虑,降低乡村社会防备感。第三,人情关系是维系乡村和谐稳定的内生机制,是促进乡村社会信任达成、情感慰藉、利益交换的核心媒介与资源。W公司乡村事业部负责人进入D村后秉持曲尽人情的相处方式,遵循乡村社会人情取向逻辑,更加“讲情面”“顾脸面”,遇事“不走极端”,向D村传递出了乡村认同感,以“当做一家人”的心态与村民“礼尚往来”,通过“相互麻烦”“上礼”等方式建立联系。

4. 借助文化嵌入革新重构传统乡土文化,助推和美文化生态

文化嵌入是社会资本在遵循乡土传统习俗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知识阅历、经营观念为乡村带来现代文化生活气息的过程,也是社会资本与乡村社会互动交流的过程。一是入乡随俗,遵循乡村现有文化规则。W公司乡村事业部负责人XZH深谙入乡随俗之道,谨遵D村本土文化规则,如D村特有宗族文化、红白喜事等,以乡村文化方式行事寻求嵌入机会。二是输出现代经营观念。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是W公司参与和美乡村建设考虑的首要因素,W公司将市场导向、质量取胜、标准化管理、平台化、智能化经营、体验式理念引进D村,拓展了D村传统的农耕文化视野,加快了D村产业现代化与城乡文化融合的步伐。三是创新与赞助本地文娱活动。W公司为活跃乡村文化氛围,会借助

开展文艺演出、传统手工体验、古建筑修缮、农家乐文化展示、体育运动赛事赞助、非遗文化保护、图书捐赠等形式积极参与和支持D村文化建设,展示其对乡村和美文化的 support 与关注,提升了W公司的社会形象与文化价值。

四、脱嵌悬浮:社会资本参与和美乡村建设的现实困境

外生于乡村社会的社会资本参与和美乡村建设是一个多维转型与动态博弈的过程,内外有别张力、投资场域迁移、身份角色变更、城乡文化差异等为其融入乡村社会带来了挑战,社会资本下乡遭遇乡土社会排异与消极应对的“悬浮”困境。

1. 角色悬浮:社会资本与基层自治的间断张力

社会资本与乡村社会的联结并非无缝衔接的,外来的社会资本与村社组织为代表的内生基层自治力量间的张力是间断存在的。一是两者角色立场与角色目标差异引发的张力。社会资本重视投资利润最大化,在现行监管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存在社会资本非法侵害农户土地权益、违法投资经营、非法推动土地非农化开发、带来环境污染等潜在风险。村社组织更多考虑农民群众利益与政治声誉,对于社会资本的不利行为具有预防、调控、监督责任,社会资本的投资行动遭到限制。二是非正式与正式权威两种角色力量强弱对比引发的张力。W公司凭借社会资源、经济实力、市场感知等优势嵌入D村和美乡村建设,是加快D村宜居宜业建设步伐的重要非正式权威力量和有益补充。村社自治组织是拥有明确法律地位的正式权威力量,深耕乡村社会,具备先天话语优势。和美乡村建设场域中村社组织与社会资本存在“主治”与“辅治”的关联,根据力量强弱划分三种状况,“双强”“双弱”“一强一弱”。“双强”与“双弱”状况下合作共赢是最优解,“一强一弱”易产生博弈内耗。而D村与W公司之间正是处于“一强一弱”的状态。建设初期,D村处于“弱村社正式权威—强社会资本非正式权威”状态,W公司容易越过参与边界,过度干预村社组织运行,容易诱发违法经营风险。建设后期,D村处于“强村社正式权威—弱社会资本非正式权威”状态,W公司话语空间受到挤压而沦为从属者,参与和美乡村建设的发展空间受限。“一强一弱”状态下的相互博弈会使追求共赢的选择渐行渐远,不利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平稳推进,社会资本与基层自治的间断张力使社会资本陷入角色悬浮困境。

2. 项目悬浮:形式嵌入与实质融入的经营权衡

一是项目“投入—产出”比值难把控。正如W公司乡村事业部负责人所言:“投资D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受自然风险、市场需求、要素供给、政策变化、法规限制等因素的影响,投资D村产业项目的前期投入大、资金回笼慢、投资获利上升空间有限,经营风险较高”。W公司获取D村土地等资源时需要支付包含搜索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监督成本等在内的高昂交易成本,上述种种限制使得W公司参与宜业产业建设陷入“成本—收益”难平衡,预期收益期待难满足的悬浮困境。二是项目建设悬浮于农民宜居现实需要。W公司采取短平快方式“经营村庄”,面临D村居民“不能融入”“不想融入”“不会融入”的问题。作为典型的传统村落,D村居民更习惯于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W公司标准化的服务质量管理体系与全流程的产业监管方式忽视了村民素质的参差不齐因素,导致部分村民不能充分融入;W公司倡导的绿色低碳生活理念面临居民高意愿低参与的不想融入难题;W公司在D村食堂改造中运用到手机支付、人脸识别等技术对于老年人并不友好,引发老年人“不会融入”的问题。三是项目做大做强难以摆脱乡情排斥。对于D村而言,W公司是“村内人中的局外人”,缺乏与D村在血缘、地缘等方面的天然纽带关联,在后期的产业项目建设中因较少与村民开展直接沟通而未建立深厚的“礼尚往来”人情关系,W公司在D村的投资项目从做大做强的过程中面临逐渐增大的村庄排斥力,由“局外人”转为“自己人”的任务尚未完成而悬浮于乡村社会^[21]。

3. 制度悬浮:资本生产与农民群体的脱嵌遭遇

一是生产环节现代绩效管理制度悬浮于小农伦理经济。W公司投资D村农业产业遵循规模化、

流水化、标准化的工业化作业生产逻辑,更倾向于采取绩效管理的方式约束员工。D村原本的小农经济,具有生产方式简单、劳作时间自由、生产经营自主性强等特征。W公司的绩效管理与D村原本小农经济高度自主性间存在张力,资本生产管理权弱化了小农生产经营自主权,进厂务工农民面临就业岗位空间与农业生产空间、亲人生活空间上的短暂分离,难以兼顾副业与照顾老幼等家庭任务。二是经营环节村民参与制度缺失弱化农民主体性。社会资本参与和美乡村建设秉承的精英导向与理性经济人逻辑使D村踏上经营村庄的道路,资本经营逻辑逐渐取代村庄治理逻辑。在此情景下,W公司逐渐成为村庄新的建设主导者,村庄宜居宜业建设取得部分成效的同时,D村农民群体在村庄公共事务参与中逐渐被边缘化,乡村社会厚重的信任联结逐渐被默然心态与显性的利益联结所取代,乡村社会原有的信任基础被弱化,农民群体的主体性遭到破坏。三是分配环节利益分配制度偏利于资本。“为民谋利”初衷异化为“与民争利”。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和美乡村建设的政策初衷是“为民谋利”与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然而,在资本逐利天性的驱使下,“为民谋利”的合作初衷逐渐异化为“与民争利”与“合谋分利”。W公司凭借自身优势往往掌握宜业产业体系建设主导权,在合作利益分配上获得更多话语权,形成偏向资本的利益分配秩序,挤占农户获利空间。

4. 理念悬浮:工商文化与小农文化的交织碰撞

一是内在价值观的冲突。社会资本参与和美乡村建设过程中,社会资本代表的工商文化与农民群体特有的小农文化在价值观念上存在差异。代表工商文化的社会资本崇尚效率,追求极致的投入—产出比,具有敏锐的商业嗅觉,社会资本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强调个人主义与自我实现。在这些文化理念的浸润下,W公司参与D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时更多以效率优先、契约精神、自由竞争、绩效管理等方式处理相关公共事务。而表征小农文化的农民群体强调尊重自然、注重亲情、友情及邻里间的互助、讲究自由劳作。小农文化的存在为W公司深度融入乡村社会立起了高墙,W公司在与农民群体的互动中“悬浮”于小农文化的圈层之外。二是文化的标签化认知误解。工商文化与小农文化都有自身独特的文化符号,而文化的标签化认知极易引发文化误解。社会资本参与和美乡村建设时易将小农文化贴上落后、保守的标签,而农民群体也易因缺乏了解而对社会资本表征的工商文化产生偏见与误解。由此引发工商文化与小农文化主体间的互斥与“悬浮”。三是发展理念的差异。工商文化注重变革与创新,敢于冒险与尝试,而小农文化注重传统与经验,趋于求稳而缺少变通。W公司在参与D村和美乡村建设中乐于且善于尝试共享经营、体验式休闲等新型发展思维,而农民群体囿于求稳取向,对于一些新的发展理念方式的响应不足,导致W公司无法充分调动农民群体参与和美乡村宜业体系建设,造成W公司“悬浮”于乡村社会。

五、融合共生:社会资本参与和美乡村建设悬浮困境的消解策略

“共生”本为生物学概念,最初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提出,认为共生是两种密切接触的异种生物间形成的互利关系,该概念提出伊始便引发了生物界的广泛关注。复旦大学胡守钧教授的“社会共生论”是国内最早将共生理论移植到中国情景中开展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成果,该理论认为共生是人类交往中兼顾各方利益的最理想的机制与架构^[22]。20世纪中叶以来,许多学者意识到共生并非仅仅是生物现象,也是普遍的社会现象,自此,共生概念逐渐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共生理论成为一种新的理论分析范式而得到社会认可,后逐渐扩展到哲学、经济、教育、科技等领域。虽然社会资本力图借助自身优势多途径嵌入乡村社会,以求寻找一套理想化的嵌入模式来有效赋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但当社会资本无法适应乡村社会建设逻辑与规律时,便会陷入多维力量博弈的漩涡而“悬浮”于乡村建设表层,无法达成长效融入和美乡村建设场域的目标。共生是人类21世纪最前沿的课题,为消解社会资本的“悬浮化”问题,社会资本必须准确把握和美乡村建设场域的共生逻辑。社会资本应转变以往单向度的机械嵌入方式,形塑全过程交互的利益共生状态,实现与乡村社会的融合共生。因而,构建社会资本参与和美乡村建设的融合共生系统,既是宜居宜业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应有之义。

1. 打造和美乡村建设共生体:激活共生单元协同力

社会资本参与和美乡村建设是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多向交流、多维合作的过程,同处乡村社会场域,社会资本有效融入的关键是与乡村社会形成“聚同化异”、互惠互利的有机共生体。首先,明确社会资本参与和美乡村建设中的功能定位。打造和美乡村建设共生体,发挥“村社组织—村民—社会资本”三力融合的最大优势,必须厘清三者的角色定位。在充分回归村民主体地位、切实强化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引进社会资本作为和美乡村建设的有效补充。为避免乡村社会与W公司相互倾轧引发的行动悬浮,D村与W公司以规范化的参与制度体系明确了D村与W公司是“主”与“辅”,D村村两委组织与W公司是“权”与“谋”的共生关系,如此,W公司参与D村建设才能在坚持党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充分发挥资本优势。其次,强化基层自治组织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共建关系。激活共生单元协同力必须将其纳入利益相关的合作关系之中,联结合作与赋权共建是减少博弈内耗的重要方式。一方面,D村构建以“村务管理委员会”“乡村共建理事会”“乡村议事堂”等为代表的联结合作型网络,加强了乡村社会各共生单元与W公司的信息沟通,增加W公司扎根乡村社会的组织合作机会。另一方面,通过参与赋权,以多样化且持续灵活的公共参与计划动员W公司为D村和美乡村建设建言献策,并对其合理意见做出积极回应,使W公司对D村和美乡村建设共生体产生身份认同而自愿融入其中。

2. 巩固和美乡村建设共生纽带:加快共生意识形成

共生意识是共生单元快速消除疑虑,强化信任,达成合作,进而形成共生体的思想基础,是决定共生系统凝聚力强弱的关键要素。共生系统内在运行有其独特逻辑,具化到社会资本嵌入和美乡村建设场域而言主要体现在利益共生与责任共生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利益共生,合理共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成果。所谓利益共生,即在不破坏共生系统内部共生单元基本利益的前提下追求新增利益的共享,实现互利共生。W公司坚持利益共享,在获取商业利益的同时真正注重为D村做贡献,如为D村村集体带来了固定收益和分红、提高了雇工待遇、改善乡村基础设施、为村民创造了就业创业的平台、建立“文化基金”支持D村公益文化事业等。二是坚持责任共生,积极支持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谓责任共生,即共生系统各共生单元均负有维护共生系统稳定发展的责任与义务。社会资本进入和美乡村建设场域,成为和美乡村建设共生体的重要构成部分,应当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关注乡村社会的长远发展。W公司尤其注重乡村资源的有序开发与环境保护,挖掘D村“村落+垛田+果园”的特色资源内涵,建立旅游与研学两大产品体系,结合千垛果园四季采摘、“耘朵”民宿等休闲度假功能,与千垛菜花、李中水上森林等景区形成合力,丰富乡村旅游内涵,助力全域旅游发展。W公司从利益共生与责任共生两个角度来巩固和美乡村建设共生意识纽带,增强了共生、共建、共享意识。

3. 健全和美乡村建设共生机制:强化共生关系维系

社会资本参与和美乡村建设面临的诸多悬浮困境既有资本内在逐利属性诱发的,也有因共生合作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外部因素导致的。因而,和美乡村建设需要借助一系列的制度体系设计来保障社会资本的有效投资,方能更长久地维系共生关系,平衡各方既得利益,摆脱悬浮危机^[23]。一是完善社会资本投入和美乡村建设的政策支撑体系。X市加大了财政对W公司投资运营D村人居环境改善类公共服务项目及乡村振兴PPP项目的资金奖补力度,减缓W公司的经济压力。X市指明了W公司参与的重点领域与投资方向,并参照浙江三农政策“明白纸”措施,明确与细化W公司投资农业农村的政策支持内容与申请方式,加快了W公司与D村的融合步伐。二是建立社会资本参与和美乡村建设的“负面清单”约束制度。社会资本与乡村社会的脱嵌源于社会资本逐利过程中损害了乡村社会的正当利益,“负面清单”机制的存在使得社会资本参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践中不得侵犯农民合法权益与农村集体产权,不得无故变更土地用途或使农地非农化。三是健全常态化的乡村人力资本提升机制,重视农民主体性。社会资本参与和美乡村建设在生产、经营、分配等诸多环节都应当重视提升乡村人力资本,W公司依托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方式促进农民适应W公司运营的绩效管

理方式,加强生产闭环的全过程培训,建立了统一的营销推广系统,提升了农民就业能力与职业水准,弱化了W公司与D村的经营张力。

4.营造和美乡村建设共生环境:促进城乡文化融合

“传统”与“现代”,“工商”与“小农”并非截然对立的,和美乡村建设场域应当是“乡土性”与“现代性”“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工商文化”与“小农文化”融合共生的文化环境。在此共生环境内,既不主张彼此倾轧,引发文化冲突与排斥,也不主张彼此取代,导致文化的丢失或遗忘。首先,鼓励尊重彼此文化差异,避免文化排斥与冲突。W公司作为乡村外来户,在面临悬浮困境后更加尊重当地文化习俗与生活节奏,仔细摸索D村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与行为准则,有效避免了因生产价值观的差异而引发的群体间排斥与冲突。其次,加强城乡文化交流,壮大乡村文化产业。W公司通过赞助乡村特色文化展、传统节日演出、传统戏剧等形式加强城乡文化交流与互动。鼓励农民发挥村庄特有文化优势,为D村特色的文化产业如锣鼓队、花船队、唢呐队等寻找对接市场,在丰富农民文化生活的同时增加了农民收入。再次,保护性传承乡村文化遗产,建立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W公司积极参与D村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通过开展社会教育活动,提高了居民对D村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增强了D村居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感。W公司将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开发相结合,提升D村旅游的文化内涵和特色,促进D村走上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六、结语

近年来,社会资本在推动乡村宜居宜业建设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基于W公司经营D村的个案研究发现社会资本通过组织嵌入、资本嵌入、关系嵌入和文化嵌入等方式进入乡村场域,不仅能优化乡村治理主体结构,改善宜居硬件基础,促进生产要素积聚,带动居民就近就地就业,同时还能促进城乡文化交融,加快乡村现代化步伐。然而,社会资本单向嵌入乡村社会时,往往会遭遇多重阻碍。由于角色立场、力量对比、利益关切、管理制度和文化理念等方面的差异,社会资本正面临角色悬浮、项目悬浮、制度悬浮和理念悬浮等“悬浮化”困境,给社会资本带来了巨大的经营风险。社会资本下乡后与乡村主体共存于乡村场域中,共生理论为其解决“悬浮化”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未来,应更加聚焦于构建职责明晰、互惠互信的和美乡村建设共生体,充分激发社会资本、村社组织、村民等共生单元的协同效能。应加快形成责任共生、利益共享、村企共建的共生理念,以此巩固社会资本与乡村主体间的共生纽带。同时,建立保障有力、分配有序、约束有效的共生机制至关重要,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共生关系。在共生环境中,应倡导交流有礼、互动有节、传承有效的良好氛围,推动城乡文化的深度融合。如此,社会资本方能够更顺畅地融入和美乡村建设的共生体系,实现从“脱嵌悬浮”到“融合共生”的蜕变。

参 考 文 献

- [1] 曹宗平,黄海阳.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动因、利弊及治理对策研究[J].学术论坛,2022,45(1):124-132.
- [2] 王文龙.工商资本下乡利弊之争——基于利益博弈的视角[J].经济体制改革,2022(1):88-94.
- [3] 陶自祥.国家在场:资本下乡与村落共富效应的路径[J].学习与实践,2024(3):50-58.
- [4] 戚渊,李瑶瑶,朱道林.农地资本化视角下的耕地非粮化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21,35(8):47-56.
- [5] 史卫民,同童.乡村振兴下工商资本下乡的主要风险及防范[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97-110.
- [6] 何雪松,张道林.制度—利益—民情:应对资本下乡不确定性的情理结构[J].社会发展研究,2023,10(4):24-41,238-239.
- [7] 席月民.社会资本下乡的风险处置研究[J].人民论坛,2022(2):72-74.
- [8] 王生斌,王保山.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下农业企业家社会资本的重构:产业逻辑、理论框架与案例检验[J].宏观质量研究,2023,11(6):102-119.
- [9] 徐宗阳.资本下乡的社会基础——基于华北地区一个公司型农场的经验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6,31(5):63-87,243.
- [10] 望超凡.从适应到自主:资本下乡背景下农业雇工管理模式变迁[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134-143.

- [11] 胡新艳,陈文晖,罗必良.资本下乡如何能够带动农户经营——基于江西省绿能模式的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21(1):69-81.
- [12] 张丽媛,万江红.农地流转如何改善细碎化经营——基于地块规模门槛的分析[J].农村经济,2023(8):37-47.
- [13] 李海金.“外源内生”:乡村人才振兴的实现路径[J].人民论坛,2023(17):56-60.
- [14] 谭羽.乡村振兴背景下土地经营权市场法律规制制度的完善[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94-104.
- [15] 陈广华,毋彤彤.乡村振兴视域下工商资本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法律规制研究——兼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5条[J].中国土地科学,2019,33(8):24-29.
- [16] 许经勇.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与变迁——关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考[J].湖湘论坛,2023,36(2):78-86.
- [17] KARL P.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M].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83-90.
- [18]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481-510.
- [19] HAGEDOORN J. Understanding the cross-level embeddedness of inter-firm partnership form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6, 31(3): 670-680.
- [20] ZUKIN S, DIMAGGIO P J. Structures of capita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economy[M].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9-33.
- [21] 蒋国河,江小玲.乡村振兴中的资本下乡与村企关系:互惠难题与合作困境[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1):111-124.
- [22] 胡守钧.社会共生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 [23] 于水,陈永强.从共识到行动:和美乡村参与式建设的经验透视与实现路径[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3(5):111-117.

The Dilemma and Resolution of Social Capital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and Harmonious Countryside: From External Suspension to Integrated Symbiosis

CHEN Yongqiang, YU Shui

Abstract Social capital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and harmonious countryside that is desirable to live and work in. Addressing the “suspension” issue of social capital participation in this construc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ccelera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social capital reshapes the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pattern through organizational embeddings, capital embeddings, relational embeddings, cultural embeddings, and other means, injecting strong momentum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and harmonious countryside that is desirable to live and work in.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dynamic game with diverse rural forces, the intermittent tension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grassroots autonomy, the balance between formal embedding and substantive integration in management, the encounter of capital production and farmers’ detachment, and the interweaving and collision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ulture and small-scale farming culture have caused social capital to fall into disembedding dilemmas, including role suspension, project suspension, system suspension, and concept suspension. Therefore,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integration and symbiosis, a new symbiotic blueprint for social capital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and harmonious countryside is constructed from four dimensions: activating the synergy of symbiotic units,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symbiotic awareness, strengthening the maintenance of symbiotic relationships,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rural cultural, so a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capital from “disembedded suspension” to “integration and symbiosis”.

Key words suspension; fusion and symbiosis; social capital; beautiful and harmonious countryside

(责任编辑:陈万红)